

傅逸尘对军旅文学作品的持续观察和研究,在2015年有引人瞩目的拓展。他认真研读了主要军旅作家的短篇小说,分析得失,更指出制约他们创作进一步升华的原因:通俗化“转向”导致文学中崇高品质的丧失(《军旅中短篇小说的尴尬与问题》)。同时,他对军旅长篇小说的整体样貌有相当出色的描述,发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一、二期的4.6万字长文《不要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新世纪十年军旅长篇小说研究》,足可见其阅读的深入扎实。同时,傅逸尘还将当代中国军旅文学中的抗战题材作品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坐标,进行视野更为开阔的比较阅读,力图寻求民族精神、民族力量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构架。

2015年的军旅文学批评,有一事最值得铭记:在可以说为人的情况下,发生了一次比较严重的“批评事件”。我之所以称其为“事件”,一是因为它的孤立性,依常识判断,这种事情不可能经常发生;二是它的结果有点出乎预料,原本可能是佯装的靶标,引来了真实的火力。“事件”的原委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创意写作教学”活动中,系主任徐贵祥把自己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一部中篇小说《识字班》交给同学们,希望他们毫无顾忌、毫不留情地展开批评。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年轻学子们以令人瞠目的勇气在那位茅盾文学奖得主头上动土。结果是,徐贵祥“引火烧身”,收获了篇幅远超过其作品的一组批评文章。这些批评文章,有的已在《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发表,并全部结集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从批评所涉及的内容看,既有深度也有广度,既有勇气更不乏卓见识。当代军旅作家中,被如此差评“青睐”者几乎没有。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一个作家能不能引起评论者注意,其作品能不能提供有讨论价值的命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她)的写作是否受到尊重的一个标志。写了大量作品但无人问津,或只是借助营销手段获取廉价吹捧,都是非常可悲的。换一个说法,作家享受到批评——无论高度肯定还是严厉批判,应被视为一份殊荣。

此批评“事件”启示良多。文学系师生磊落相见,教学相长,推行活泼教学理念是一个方面;涉入文学不深的年轻作者,挑战具有一定影响的军旅作家的权威性,破除对所谓名家、大家的迷信和简单崇拜也是一个方面。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年轻无畏的批评者们在徐贵祥的小说中确实发现并指出了其创作上的许多重要破绽,从文本层面、艺术思想层面、审美理想层面,甚至价值观层面,提出了新的而且是重要的见解,这尤其令人鼓舞,而且意义重大。因为徐贵祥在当代中国军旅作家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徐贵祥创作的优长和缺陷,他笔下人物形象塑造的成败,正是在大部分军旅作家那里也普遍存在的。

徐贵祥苦心孤诣,意在推动教学实践,成效如何,且当另外评说,但他在文学世界里“以身试法”的勇气,他在面对后生晚辈口无遮拦的批评解剖时的从容淡定,非常值得尊敬。毋庸置疑,这样的一次作品与批评的碰撞,对长期以来军旅文学有写作而无批评的状况的改变,是标志性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

# 由“批评事件”到批评精神

——2015年军旅文学评论的启示 □殷 实

军旅文学的理论家、批评家对军旅作家和作品基本上丧失了有效的观察,当然,批评本身存在的意义也就基本上丧失了。虽然我们看到每年都有评论文章发表,有研究专著出版,但从总体看,无论是美学旨趣方面,还是社会理想、精神文化信念方面,军旅文学的批评家们都是面目模糊的,没有严苛的艺术标准,没有清晰的价值尺度,没有科学的评价方法。依此反观,许多军旅作家甚至滋生了可任意作为的幻觉,以为仅靠一定的声名积累,就可以永远写下去,作品本身的优劣则根本无需置疑,似乎只要能出版、能发表,或者取得一些市场售卖的成功,作品就算彻底完成了。作品与读者、文学创作与研究评价、文学最终的接受状况及社会效应这些层面的多重关系,似乎都已解体,至少在军旅文学队伍中我们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在此对小说《识字班》的“毁灭性”批评中,虽然暂时未见理论性或方法论意义上的鲜明创新,但众多年轻的批评者们各据战位,攻其一点,打击可谓精准。徐贵祥以抗战时期一个农村女子识字班几位女性及其丈夫为描写对象的这部小说,写得痛快饱满,一气呵成,甚至忘乎所以,结果留下了太多显而易见的遗憾,而杂志社方面因急于推出作品,似乎也放松了编辑尺度,留下了诸多显而易见的漏洞。即如在读研究生李梦媛所作的解读,《识字班》虽可见徐贵祥“从脸谱化、类型化、英雄化的人物塑造中挣脱出来”的努力,但最终对女主人公傅菊珍这个人物的塑造仍存在着重大缺陷,他没能让这个人物获得成长:“从一个粗浅的农民阶级快速地过渡到一个愿意为了战斗的胜利而大义灭亲的英烈女”,这样的处理是“唐突的”。

同样,徐贵祥在《识字班》里着意塑造的金广友这个形象也遭到了强烈质疑。另一位研究生徐彤指出其在人性问题上的严重局限。“在《识字班》中,正是金广友这个人物,将战争最真实也是最残酷的一面,毫不留情地呈现在了自己的妻子与读者面前(畏战、怕死)……一般人都会具有的这些恐惧和怯懦,中国现当代的战争文学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悲天悯人的反思与关怀。”徐贵祥的处理是,“在最后关头,金广友一改‘逃兵’本色,变得无私无畏,英勇杀敌,即使面对妻子的劝说也不为所动,仍是生死不顾,矢志报国,挨了一身枪子后,终于气绝身亡。”徐彤认为,“金广友的死,如果能够回归到人物本身欲望上面,赋予他一种毁灭的极致之美,也许会达到更好的效果。而在作者笔下,人物的欲望,在结尾之前的确已经积蓄到了一种几欲喷发的地步,可是最关键的收尾处,这个人物所有原初的、发乎本心的欲望和需求骤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外部赋予他的使命和责任,是一种早已被意识形态化了的东西,甚至连他的死都是为国捐躯,为了‘人类伟大的解放事业’而

献出生命。其时,金广友已经再度‘回归’绝对主流和意识形态化‘宏大叙事’的铁律,‘回归’到了诸多军旅作家笔触共同写就的那支‘战斗英雄队伍’当中。”像徐彤这样的意见,不仅对徐贵祥的单篇作品,对大部分禁锢在相同定式中军旅作家的写作,都可谓振聋发聩。李梦媛进一步提出,徐作中“用男人们对于性和肉体的欲望来刺激他们冲上前线的动力,这似乎扭曲了男人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初衷。但从《识字班》这个题材上来看,其原本所要表达的主旨应该是农村妇女在识字班中的学习与蜕变,以及她们对家庭、丈夫等产生影响,从而表现她们对战斗胜利功不可没。但读完全文后,总感觉文中的两性关系似乎略有压弱原本主旨之嫌。最开始以肉体的欲望鼓励丈夫参军参战,之后以同样的方式奖赏他,满足他,包括其中殷福塘以觊觎别人的媳妇为目的参与战斗,这样的情节安排似乎将两性关系的比重扩大得比预想中的多,所以可能也因此冲淡了原本所要表达的识字班对于战斗胜利的作用”。这就涉及到军旅文学中女性意识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几代军旅作家,甚至是女性作家那里,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个看法在纵华政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傅菊珍们觉醒的女性意识,只是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属性并利用了这一属性”,“傅菊珍不是姐姐,她的女性意识还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高度自觉。起码,文本还没有给她成长的空间。她在金广友三人逃兵路上的‘劝说’已经生硬了,当在民工路上捡起枪瞄准自己丈夫的时候,令人顿时陌生起来”。所以,“只是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是运用男性语言在写女性,而不是用女性语言来写。”

还有结构问题:“纵观全文,很明显可以感觉到故事的铺陈应该是有明暗两条脉络贯穿其中的,一条是后方识字班女人们的蜕变,另一条是前线男人们的战斗与成长,而作者选用《识字班》作为题目,显然是要以女人的作用作为主线去完成这篇小说。通篇看来,其实女性在识字班的成长历程并没有所预期的那样丰富,反而是男人们,从怯战到参战,从可耻的‘皇协军’到人人称颂的‘英雄’,从想要叛逃到回归队伍,这些成长与蜕变已经慢慢地成为了作品的主线。而对于女人们,多是突出了他们的影响而淡弱了她们的成长,这似乎已经将明线暗线颠倒而置了。”类似的犀利见解不胜枚举。批评的触角真正深入到了文本内外的诸多方向。路迪雨婴将《识字班》中塑造的傅菊珍与孙犁《荷花淀》中的抗战女性形象做了文学史意义上的比较,认为“相对于孙犁笔下女性形象的雷同化、概念化,具有保守性,被传统的日常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限制了自由和发展……而在《识字班》里,一个性格独立爱憎分明,敢

于突破传统封建礼教的鲜活女性形象,这背后有着作者要防止女性角色类型化的意识”,然而她笔锋一转说:“由于整部小说开场描写人物性格的铺垫不够,导致傅菊珍的性格弊端特别突显。甚至有些地方会给人造成一种她贪图虚荣的感觉。比如她让自己的丈夫去打鬼子,给人的感觉是她的抗日动机不是从一个民族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雷从俊也观察到:“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胸怀国家、深明大义,都不约而同、急不可耐、费尽心机地送郎上战场,都把自己当作‘慰劳品’而自己毫无‘需求’,甚至面对战争也都很少有基于女人的‘一己之私’和千回百折的心路历程,更缺乏坚硬之下的柔情”。不一而足。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举例上述批评“事件”所包含的信息,并非是要就事论事,我希望通过检视其中所散发出的积极能量,简单阐明一点:目前的军旅文学发展中批评精神的失落,要对当前创作的失范负上一定的责任。现在我们看到的,除了大量无关痛痒的作品讨论会发言,除了不断重复的一些镶嵌了“英雄”、“家国”词语的空话套话,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可言。今天已经在出版这样那样的军旅“文学史”,包括对一些作家的研究专著之类,很多质量参差不齐、水准平庸甚至低下的“作品”,正在被盖棺论定;一些粗劣不堪的作品,正在被推向“经典”的格位。这种急切追求当下的成就感而不是对历史负责的病症,一如当今社会其他方面所见。

现在我们尤为需要的,是从思想理论、文化哲学高度,对多年来因加速度“成就辉煌”而造成的恶疾加以矫正,而这需要有思想影响力、有美学建树的理论和批评大家。面对目前产量够多但质量难成正比例的军旅文学作品,如何定位,怎样评判,能不能准确辨析和确认其艺术上的优劣,严格区分其价值趣味的高低,都有赖批评的担当。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清明、法度的严明、立场的坚定,这些必不可少。具体一点,军旅文学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军旅作家的艺术品格、思想修养和社会责任问题,这些都需要准确的理论说明和精微的批评阐释。事实上,从文本(包括形式)批评,到社会学批评,从对一般的美学问题的检讨,到对时代思想与道德状况的探察,批评家们可供遵循的方法和尺度都是现成的,我们并不需要发明特别的方法或语言。只要能够认真地去阅读,实事求是地加以鉴别,诚挚地说出自己的认识与判断就可以了。正如围绕《识字班》展开的“批评事件”所显示的,在今天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一般的审美经验问题、社会思想文化问题,乃至作家的趣味、价值诉求问题,都是完全可以进行理性探讨的,也是可以进行交锋辩难的。甚至一些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比如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对历史表达中洞见或歧见的论争等等,也是可以从学理、学术层面开展的。

惟愿发生在2015年的这次“批评事件”,能够对军旅文学中匮乏已久的批评精神起到一次召唤作用。

(上接第6版)而浅显易懂并非一定要直白,这是要上升到艺术领域反复探讨的问题,对诗歌艺术有一种理性的尊重就是对诗歌的尊重,不是所有人都能写好诗的,也并不是所有人写出的就称之为好诗,那个“全民创作”的时代已经界定为笑话了。相反,有的诗人把诗歌当作一种纯粹的语言游戏进行文字表演,这样做的结果,要么是意象繁杂,语言缠绕,导致晦涩难懂,要么是直白无味,口语泛滥,诗意全无。

检视2015年军事题材诗歌,不少的诗章在对诗歌语言的安顿上注意到了美学的在场。“我知道,即使我的头颅垂得再低/也不能抬高那些亡灵的尊严”(广子),这里的每个词都锋利无比,而句子却像规则的锯齿,闪着寒光。“在南京这地方,像野兽一样/吃着这些东西/我总吃出一种/血腥味”(马萧萧),对于敌人在南京给民族血脉中导人的深重苦难,难以因为美食而稍有消解。“那些石块是山地、丘陵打碎的牙齿”(李林芳)用“打碎”一个动词,十分形象地呈现了石块的形状及反射到人心里别样的感觉。“不可接近的几笔雪”(推雪),在诗人眼里,祁连山连绵不绝,祁连山上的雪也是连绵不绝,但这种自然界的“大”在使命与责任的驱使下立刻变“小”,心理上的“小”并用“几笔”形容,诗人采用绘画线条勾勒的绘画效果恰恰雕刻了军人的灵魂走势,这和他“我泥沙俱下的泪水和表情”一样,都在造词境界中左右逢源地排兵布阵,词的命运和美感都在语言细节的安顿中出色出场。语言自然要为诗歌中的拟人及比喻提供素材:“每一棵苍松都能挡住一次坏消息”(周承强)。诗人正是通过语言和美学的结合,才使那些关于诗歌的持久思考具有直接的可感性,语言敏感而诗思缜密、情感收放,在不同的诗人那里均有不同的艺术尺度和美学品相。

就军内外诗人驾驭军事题材整体的能力而言,非军旅诗人并不能做得得心应手,情感投射很容易流于空荡、浮泛和狭隘,即使是一线诗人也不例外,也许军旅诗人生存的环境及自身的身份确认注定了在军事题材领域有自我表达的先天优势,这是可喜的。但是,过去一年的军事题材诗歌公认的优秀诗歌仍然不多,传唱的佳作更难见踪影,相反,生活的同质化和获取信息渠道的单一,使得相似题材的表达技巧、修辞方式和追求情感的激烈碰撞,使诗歌面目相似而缺失其独特性,同时在想象力、聚合核的力量力度、情感的控制、凸显当代的新鲜经验与美学的修养诸方面,无疑是需要继续面对的诗学痼疾和难题。

(上接第7版)

从创作题材、形式而言,报告文学这种所谓“艺术的报告”更强调了作家思考的独立性和现实题材的关注。曹岩、马泰泉的《极度威胁》记述了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积极参与援助西非国家抗击“非洲死神”埃博拉病毒的征战实录,文本的内在张力使人领略了非常态下中国军人英勇奋斗的大义品格。高帅的《跨越喜马拉雅的大爱》中,14集团军官兵飞越世界屋脊投入尼泊尔展开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把13亿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播撒到地震废墟上。通过参与地震救援,防疫消杀、医疗救助的救援历程,全程写下了极度危险中的感人瞬间和人道精神。李燕燕的《青藏线六十年》以生命线上发生的故事,凝结了军民鱼水无限深情。60年来,官兵们把爱民的种子撒遍青藏线的角角落落,用真情大爱将共和国的重托与藏族同胞的幸福连接。曾剑的《边塞风流》写下了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的仓库驻军,在恶劣的环境下实现着强军梦想,坚守军人精神气节。张剑的《我们和草原有个约定》本着“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的生态建设目标,展开追逐绿色梦想的步伐,深刻反映军民血肉相连的社会氛围,全方位、多层次拓展了草原双拥工作的新局面。李传永、祝平的《守护在人间天堂》以地处阿坝高原的武警森林官兵极力实践着“情注绿色生态,爱洒熊猫故乡”的庄严承诺为关注点,突出反映他们以森林为家,与国宝为伴,忠实履行着生态安全的神圣使命。这些作品没有叙事背景的宏大,但人性光环之下却有着独特的思考与审视,实际上都是时代与人物命运的相互交织。

纵观2015年度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作,虽然没有表现出战场上的硝烟炮火,但和平时期的军人的风骨和英雄情怀,依然充满着探索的本质。正是这种鲜明的风格底色和时代精神,促使着作家在文学实践中彰显本色,也使报告文学写作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范式。

王凯长篇新作《瀚海》以立体的方式展现了深藏于无边瀚海中的空军基地,让读者得以走近那片并不熟悉的沙漠和它的守望者,了解和平时期的军队基层的整体风貌,感受沙漠军人的日常生活和其中蕴藏的独特的军人情怀,难得地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瀚海,这个不断闪现在古代诗文典籍的美好词汇实际指的是沙漠戈壁。相信如果不是军旅作家王凯多年的潜心挖掘、精心营造和着力表现,许多读者并不知道在西北地区还有一片叫做巴丹吉林的沙漠,更不知道那里还有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和一群在戈壁沙漠中坚守的军人。而在王凯将它写进了他的作品之后,它便俨然成为了当代军事文学版图中一个重要的地点和标识,《瀚海》的诞生则无疑更加重了它的意义和分量,并为王凯对它的长期经营赢得一次完满的阶段性成果。对于不熟悉沙漠的人,只能看到它的荒凉和空无一物,但对于长年生活在其中并深爱着它的人来说,却能看到它单调之下的复杂、荒凉之下的丰饶。正如唐代的边塞诗中,总是有从金伐鼓的英雄气概和羌笛望乡的厌战情绪并存,美酒琵琶的豪放气魄和思妇空洞的幽怨心理相映,这种丰富性和矛盾性共同构成了边塞诗的美学意义,那么,在王凯的小说里,同样存在着对沙漠和沙漠军旅生活丰富多样的追求,沙漠不但是涌现无尽素材的富矿,它本身的丰饶、博大和深邃也影响着王凯作品的审美意蕴和风格走向。

沙漠、军营、年轻军人。在一个不够成熟或者受到简单理想主义影响的军旅作家手中,这些要素足以构成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成长故事,而沙漠则不出意外地被设置为锻造意志、磨练心性的绝佳场所,一句话来说就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然而,出现在《瀚海》中的沙漠却绝非如此简单。它是地理概念,也是故事的背景,它还是人生的参照物,或者一种外部力量的象征。它是人性化和个性化的,是属于主人公叶春风的沙漠,是属于他的同龄人钟军、兰兰、车红旗、白雪歌等人的沙漠,也是属于空军基地全体军人的沙漠。自从叶春风衣兜里灌满沙子来到它的腹心地带之后,他的整个青春岁月便与它须臾不可分离,他每一次的辗转流落,每一次的荣辱升降都与它息息相关。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小说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不可或缺且别具意味。

叶春风十几年的从军经历串连起的是整个基地的那些人和事,它们和基地本身一起构成了王凯在《瀚海》中刻意塑造的那“一座营盘”。和平时期的军营自然有着与战争时期完全不同的风貌,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战斗单位而更像一个巨大的机构,这使得它更难以在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被表现,常常让试图整体把握它的作家们陷入苦恼和困惑。《瀚海》显然用扎实的创作实践对这个难题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突破,并对军营生活的表现范围和表现层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拓展。小说通过叶春风在数个岗位的转换,揭开空军基地神秘的面纱,透视了部队基层的多个侧面,从而绘制出一幅新形势下科技战线部队较为完备的全景图画。这幅图画的绘制过程充分发挥了王凯擅长写实的优势,也是他对“处处有生活”的文学原则的一次绝佳诠释。无论是加注队、器材股还是回收队,这些很少被别人写到的非战斗性部门和岗位在他的笔下却丰富多彩戏味十足,再加上那些在文章中频繁出现的高科技武器术语,无疑给读者提供了一次对新型部队猎奇式的阅读窥探。并且围绕着每一个岗位,小说写的都是踏踏实实的部队生活,这里没有表面化肤浅化概念化的简单再现,也没有假模假式拿腔拿调的刻意营造,只有基层官兵日常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只有他们日复一日的吃喝拉撒行动坐卧,真实入骨,细致入微,针针见血,刀刀见肉。那种新鲜而生猛的生活景象通过王凯别

# 瀚海无边 营盘牢固

——长篇小说《瀚海》读后 □鄢 莉

开生面的表现,赋予了这座营盘以生命,让它不再是一个空洞的躯壳,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内部的肌理和血肉纤毫毕现,触手可及。

营盘的灵魂终究还是人。《瀚海》刻画了一个丰富的军队人物群体;不止于此,往更深层的层面上说,是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基层军营生态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层次分明而又错综复杂,团结合作而又关系敏感。这个体系终日应对的不是战斗而是各种刻板乏味的军事训练和日常工作,在它的内部频频发生着成员们性格、意志和力量的较量。尽管地处沙漠之远,这个小社会的复杂程度一点也不比大军区大院来得小。它是如此庞大和实际,足以冷却叶春风这样年轻军官的热情,耗损他们的雄心,让他们的军旅生涯很大程度上都处于和它的紧张关系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反复写到了这个体系中的游戏规则。正如小说中所传达的,在军队中成长首先面对的往往是规则。这些形形色色的规则既有官方制度规范的一二三四,也有人际交往原则的甲乙丙丁,还有各种潜规则的ABCD。如何在体制中生存发展,学习规则是年轻军人的必修课,只有学会了规则,才能游刃有余地操作规则。《瀚海》的主人公叶春风就是在一次的摸爬滚打中,在一次次冲撞到头破血流的过程中熟悉着基地的游戏规则。《瀚海》通过揭示规则对基层生态体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寻和解剖,也因触到了军人与军规、与体系的矛盾冲突,从而拥有了更耐咀嚼的思想内核。

在这个体系中的个人自然也不是军事文学中常常出现的那些军人形象。塑造军人的正面形象,特别是塑造英雄人物,似乎是军旅文学天然的使命。然而,军事文学长期强调的宏大叙事和英雄神话,让炮制英雄成为一个机械的生产过程,就像小说中的宣传干事兰兰一样,需要对宣传的人物反复升华无限拔高。幸运的是,身为军旅作家的王凯却聪明地避开了这个圈套。在《瀚海》里他描写的只是一些最普通的基层军人,而且他们中间的一些明显带有“反英雄”的特点。这些军人在他的笔下显得本真而世俗,在坚硬的军装之下跳动着一颗颗凡夫俗子的心。他们喝酒打架,忙于升迁或恋爱。他们怀揣着梦想,也怀揣着各种各样的私人目的和强烈的七情六欲,在基地这片天地里追求着各自的人生目标,完成着或者消磨着他们的人生。他们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军人形象,但又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人形象,和少数特殊材料制成的英雄模范相比,他们显得更加真实可感。《瀚海》中也并非没有写到英雄或英雄行为。只不过,王凯似乎更倾向于认为英雄的本质就是凡人,没有人生下来就是阿克琉斯或者贞德。他宁可相信,英雄是在一定机缘巧合下短暂地克服了人性弱点而成了全了自己,如成功排除加注故障的叶春风;或者是人性正面力量的长期坚持最终塑造了高尚的人格,如因公殉职的冷高工。

当然,过分强调军人的人性又将陷入另外一个误区。在一个远离了战争的时代,如果丢失了军人特有的血性气节,部队有沦为一个机构、军人有沦为一个饭碗的危险和忧患。在不过分拔高和生硬捏造的前提下,如何写出和平时期的军人精神和军人性格,同样是军事文学创作中一个不好处理的问题。王凯对这个问题也自有其思考。《瀚海》中确实描写了某些军人身上的凡俗化倾向,

但也写出了一些超越凡俗的性格特点。就像军旅作家朱苏进在小说中总会塑造一些孤傲清高、睥睨一切,拥有雄心壮志,渴望建功立业,不屑与庸人为伍的军人形象,通过他们来彰显某种军人性的话,那么,王凯则喜欢塑造一些冲动叛逆、桀骜不驯,渴望自由生命状态和自我超越的年青军人,用以表明他心中理解的军人性。小说中的叶春风无疑就是这样的类型。比如,他总是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永远拒绝着体制的同化;他执著地追求一份空幻的爱情,并常常脱离道德说教去思考一些玄而又玄的问题。在庞大的军营中,叶春风这样的年青军官如同瀚海中的一颗沙子,但他却是一颗有棱角的不想被打磨的沙子。尽管他这种多血质的性格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诸多麻烦挫折,但正是这种血气方刚的生命力,抗衡着军营中暗暗滋长的暮气、腐气,让军营保持着年轻和活力;而且可以想见的是,这种性格就如同朱苏进呼唤的军人的精神强力一样,最可能在未来的战场上转化为战斗力。“叛逆”军人叶春风,和小说中塑造的以袁教导员、曹股长、冷高工为代表的另外一批有担当、有坚守的军人一样,他们共同维系着军人之所以成其为军人的那些东西,传递着军队的血性基因,铸造着军人的强大灵魂,完成着对军人这种职业的精神超越。

就是这样,在长篇小说《瀚海》中,王凯在通过将日常化和个性化带入到对军人形象的摹写之中,把真性情和真本色投注到这些人物的身上,层层剥除和消除了曾经强加到军人身上那些虚假矫饰的东西,既还原了真实的军人形象和军人人性,又保持了理想主义的底色,让真正的军人精神和品格的光辉焕发光彩。新时期以来军事文学一直有回归写人的趋势,逐步淡化着以往那种“假浪漫”和“伪崇高”,这些在王凯这里算是消解得比较彻底。可以预言,他塑造的这群带着强烈时代印记的真实军人,在若干年后,将是军事文学史里留得下来的形象。

最后再回到成长这个主题。按照某些通常的故事模式,凡是写军人的成长,必然会写到人物经过宝贵的部队生活锻炼,领悟了诸如英雄主义或奉献精神